

论经济体制改革对生活方式变革的影响

李超元

我国人民生活方式中的一些明显变化，实际上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在时间进程上呈现出与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同步发展的趋势。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种变革间的密切联系。本文取狭义生活方式的范畴规定，分别从家庭婚恋方式、生活消费方式、时间支配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几方面的变革，来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作用，没有涉及劳动方式的问题。

一、经济体制改革对家庭婚恋方式变革的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使许多家庭由单纯的消费单位，变成了兼有生产或经营职能的单位，如农民家庭和城镇个体工商户家庭就是这种情况。经济职能的回归，给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经济体制的改革，一系列新政策的提出和贯彻落实，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风尚的变化，对于还不能摆脱经济影响的婚恋选择标准，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1. 家庭经济职能正在造成新的家庭形态

我国的家庭，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日益趋向核心化、小型化。这种发展趋势相对原先的大家庭而言，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上的分离独立，是血缘纽带的松弛，是一种“分”的趋势。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那些担负起生产或经营职能的大家庭，由于劳力多、便于分工协作，其功能就比核心家庭、小家庭的“孤军作战”显出更大的优越性。这里有个规模效益问题，即人少了不行。这样一来，一些尚未分化的大家庭，分化便滞缓下来；而一些已分户单过的核心家庭，则开始按血缘关系重新结合。表现为一种“合”的趋势。这种“合”的趋势与“分”的趋势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兼有大家庭和核心家庭某些特征的、吸收了二者优点的新的家庭形态。这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家庭以明确的经济利益为目的而结成的组合家庭，或者是在大家庭内用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划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实体。例如湖北省房县良种场工人吴则定以订立合同的形式组建了一个家庭农场。合同规定儿子吴岩平承包一台拖拉机，年上交利润三千三百元，三年付清后，拖拉机归儿子所有；吴岩平给父亲犁地，父亲按规定付费。这个合同由司法干部监督执行。他们在伦理关系中，又用明文合同形式增添了一种承包责任制的新经济关系。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家庭关系上的延伸和反映。在这类家庭中，血缘纽带和经济纽带有机结合，在维系家庭关系上共同起作用。它既不失大家庭劳力多、便于分工协作的优点，又兼有核心家庭经济相对独立的优点。它既不同于以前那种主要靠血缘关系维系的生活型家庭，又不同于一般的无血缘关系的经济联合体。它与合作化以前的那种具有经济职能的旧家庭，也有着质的差别。一般说它的构成有着明确的经济契约的形式（成文或不成文的）；在家庭关系上有着

较自觉的经济责任意识；它的家庭成员在支配个人经济收入和个人生活上，有着以前所没有的独立性。从本质上讲，这类家庭具有商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分工更自觉、经济关系更明确的家庭发展的一种新形态。这种新家庭形态的优点表现为，分工意图明确，经济责任清楚，按劳取酬，打破了以往家庭生活中的“大锅饭”，家庭内部权、责、利结合，有利于调动家庭成员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解决和避免一些过去难以处理的家庭矛盾，从而更好地协调家庭人际关系。这种家庭新形态的发展前景，应该待其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后再下论断。不过，对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给家庭关系和结构带来的影响来说，它的出现却是有典型意义的。

2. 家庭经营方式正在造成“能者当家”的家庭新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农村生产主要是集体经营，从整个生产安排到生活资料的分配，每个阶段、每个环节都是由生产队集体组织管理。家庭成员只是作为自然人、作为单个的劳动力编入生产队。家长的职能主要是管理家庭生活资料的消费和协调家庭人际关系，有时也代表家庭出面处理家庭与邻里、与生产队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当家者多是有生活阅历的长辈。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联产承包责任制把生产经营的职能转移到家庭。当家者除了要管理家庭事务，还要肩负起生产经营的组织管理工作。生产或经营计划的制定、劳动力的分工、以及有关的采购、运输、销售、科学技术的运用、信息的收集和处理等等，都要由一家之长统筹安排。这种家庭经营的方式，就对家长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较高的要求，从而使以往那种血缘关系上的长者一般都是法定当家者的传统，受到冲击。能否带领全家走上致富的道路，是对每个家长能力的严格检验。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那些承担了经济职能的家庭为了尽快致富，必然要对家长——家庭经营管理者的人选进行调整。一些年老体弱、能力不强的长辈，在调整后虽然还保持着“家长”的名义，但实际上已经不在经营上当家了。真正当家的已经转换为能者。在能力上，他们或者是家庭的主要劳力，或者有文化懂科学技术，信息灵通，或者掌握有某种传统技艺；在血缘关系上可能是原先的家长，也可能是子女媳婿等。权力移交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由原来的家长口头授权，有的是全家民主选举，有的是“揭榜招贤”。在农村，不少家庭发生了这种管理权力的转移，让年轻的“能者”当家。由于他们一般都年富力强，有一定文化和科学知识，心灵手巧，联系广，信息快，思想解放，大都能较好地带领全家进行生产和经营，有的家庭较快地走上了致富道路。新的当家人在实践中逐渐树立起威信，说话算数，在处理家庭事务中举足轻重。经过实践发现有不称职者，家庭内还会重新调整。这种“能者当家”的情况，打破了传统的伦理层次，树立了一代新风，也是对封建的“家长制”、“一言堂”残余影响的冲击。“能者当家”不仅给家庭经营带来了生气、活力。而且有利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培养一代适应商品经济的新人。

3. 经济领域的变革促使婚恋择偶日益注重“人才”条件

近些年来，婚恋的择偶标准在发生明显而又微妙的变化。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日益重视对方的文化知识水平、才干能力、进取精神和开拓性能力等。而对于家庭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目前的工资收入，虽然仍在考虑之列，但已退居次要位置。这反映了他们在更多地关注婚恋的精神生活，更多地用长远的、发展的眼光，从潜在能力的角度来寻求配偶。不仅关注现在，更关注发展前景。前一阶段，不少女青年愿意找大学学历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生等。现在又进了一步，据上海有关部门调查，又兴起了找有开拓精神的“经理型”丈夫。广西《宾阳报》的记者在农村调查中，发现广西农村姑娘找对象的条件发生了变

化：首先找有经济头脑的青年；二是找口才好的人，因能说会道的人联系广、信息灵，富得快；三是轻聘礼重才干，认为找个有才能的人就等于找了个“财神”。也有不少农村姑娘改变了以往不愿嫁庄嫁汉的想法，希望找个能干的农民，互帮互助，一起发家致富。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主要动因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1)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城乡经济搞活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男女双方都不用依赖借助对方及其家庭的经济力量来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在物质生活丰富提高以后，精神生活的问题就会突出出来，在婚恋过程中更注重感情、志趣、性格等方面的和谐一致。这与心理上的需求转移规律有关。

2) 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激发了对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信息的内在需求，使知识、智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改革本身就包括从政策上鼓励掌握知识技术、尊重人才。这就促使社会上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热潮，并逐渐凝结为社会风尚。因此，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的人在人们心目中和社会现实中的地位都升高了。据有关单位对北京六个城区、近郊区的职业评价方面的抽样调查，概括出被社会公认的、前九项理想职业是：大学教师、医生、自然科学家、电气工程师、社会科学家、建筑工程师、记者、作家和中学教师。从这一抽样调查中可以窥见人们价值观的某些变化。这种价值认识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势必影响到婚恋择偶标准。

3) 经济体制改革使人们的经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随劳动成果上下浮动，甚至发生大幅度变化。这里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是个人的能力才干、文化知识水平、掌握科学技术的程度、创造性开拓能力和社交能力。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各方面政策，又为这些强者大显身手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事实上先走上富裕道路的往往是这些人。另外，由于这些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往往精神世界较丰富，性格开朗，因而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二、经济体制改革对生活消费方式变革的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包括着对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调整。同时，还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消费水平、消费观念、消费结构的变化。这几年人们的消费水平之所以有明显的提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工农各业生产的发展，从而使生活消费品增多，居民收入增加，为消费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除此以外，经济体制改革对消费方式的影响，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经济指导思想的转变推动着消费观念的迅速转变

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转变经济指导思想。过去，在指导思想上片面强调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而忽视消费对生产的积极的反作用，重积累，轻消费。往往不适当地用限制消费的方法来扩大生产和积累。在生产组织中，对消费品的生产安排得不够充足。结果，消费品供应不足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许多主要消费品多年来不得不凭票供应。这种消费状况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压抑的、紧张的消费心理。再加上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以及千百年来小农经济的消费习惯沉淀的束缚，使人们的消费观念中含进了一些消极的、落后的、保守的东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在生产与消费、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了错误的认识，一再明确提出要在生产发展允许的限度内，使人民的消费逐步有较大的增长。根据这一新的正确的经济指导思想，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在实

际工作中非常关心消费问题，鼓励、引导人们改变旧的消费方式，树立积极的、科学的、文明的消费方式。各种舆论工具也积极地配合宣传，使正确的消费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这种正确的经济指导思想的贯彻执行，一方面较快地推动了消费品的生产和更新换代，缓解了消费品长期供应不足的矛盾，并激发了人们新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则打破了消费观念上的种种束缚，在全社会造成了鼓励合理消费的风气，促使消费观念迅速发生深刻的变化。

人们消费观念上的变化，可以作这样一些概括：

过去，人们不敢大胆消费，怕“露富”，生活上能够维持温饱、略有改善就很知足了。现在，人们不再满足于消极的消费方式，开始追求积极合理的消费方式。消费标准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升高。部分居民中已出现“吃讲营养、穿讲漂亮，用讲高档，住讲宽敞”的苗头。一些条件许可的家庭不仅注重消费的实用性，而且开始问津高档的装饰性消费品；过去，人们消费“随大流”，消费心理倾向于求同，消费品的生产单调死板。现在，人们不再满足于这种单调化一的消费方式，开始追求多式多样的消费。消费心理倾向于求异；过去，消费品更新换代缓慢，有些是“几十年一贯制”。现在，人们不再满足于这种缓变型的消费方式，开始尝试速变型的消费方式。买东西虽然还考虑经久耐用，但同时也考虑适应时尚的变化。青年人表现得更明显。由于目前人们的购买力普遍不高，更多的表现出“廉价中求新求美”的消费心理，以适应消费品更新换代较快的要求。过去，人们囿于本地区、本民族的消费传统，接受外来的消费方式很慢。现在，人们不再满足于这种封闭型的消费方式，开始形成开放型的消费方式，注意吸收外地和国外消费方式中好的内容，关心各地消费信息。

应该肯定，我国消费观念上的变化，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消费观中有民族性的和积极意义的内容，而是辩证地扬弃。改掉的只是那些不适应的东西。至于生活中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勤俭持家，朴素大方，反对铺张浪费等等好传统，仍是人们奉行的基本消费原则。当然，在有些人的消费观念中也出现了某些不健康的東西，这并不是主流，需要给以正确引导。

2. 经济体制改革促使文化消费日益增加

近年来消费结构变化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发展资料的消费不断扩大。人们用于购买书籍报刊、自费学习和进修的开支，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不断上升。1978年城乡居民平均每百人每天有报纸3.3份，1983年就增加到4.2份；1978年人均每年有图书杂志4.8册，1983年增加到7.4册。在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许多农民自费上各类学校和技术培训班，有的甚至不惜花上千元到高等院校当旁听生。

造成文化消费增加的原因很多，其中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领域的变革对文化产生了内在需求。在经济的发展中，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信息起的作用日益重要。生产和管理的现代化趋势，对劳动者、管理者智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脑力劳动的比重扩大。要适应这种变化，就需要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这势必带来发展资料消费的增加。另一方面，在招工、聘用、晋级、评职称、提干等劳动人事政策上，都对文化水平和智力才干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激发了发展资料消费的增长。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文化需求增长的推动作用更突出：1)改革使农村的家庭经营上升为主要的经营方式。这时，农户个体要独立地面对生产和经营中的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如各种自然灾害和市场变化。同时还要面对商品经济带来的竞争。这要求农民有较强的随机性和科学性，必须借助于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信息的力量。2)改革使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多种经营的兴起和发展，使许多农户转为专业户、兼业户。1983年全国专业户已达

2,483 万户。这种经济结构上的变化要求农民具有通用性和多用性。农民每转入一个新的生产或经营领域, 马上就会面临知识和技术的更新和补充的任务, 对信息的需求也会猛增。即便是靠传统技艺的专业户, 随着生产的发展也有个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和设备改造问题。因此, 这些也会产生新的文化需求。3), 改革扩大了农村的商品生产, 使农民必须服从社会供求原则和社会通行的商品生产原则。农村同城市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 农民开始“打入城市”, 从而增加了对城市经济的依赖性。农民不仅要掌握农村方面的信息, 而且要及时掌握城市经济、生活等方面的信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不增加文化需求。

总之, 正是改革带来了经济领域的种种变化, 对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信息产生了更强烈的内在需求, 促使着人们不断扩大发展资料的消费。

3. 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商品生产的发展, 促进了消费的商品化、社会化

1978年以前, 我国农村基本处于自给、半自给状态, 农民消费的商品化、社会化程度不高。在不少偏僻的乡村, 还是自家织土布做衣, 自家搓麻绳做鞋。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农村生产向大规模商品化转变的势头很猛。商品生产的发展, 要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从事商品生产的劳动者不再是个人消费用品的直接生产者, 消费必然日益依赖于商品交换, 从而促进了农民消费的商品化、社会化。1983年农村商品零售额比1978年增长了1.1倍, 平均每年以15.6%的速度增长。农民生活消费开始由自给性消费为主转变为商品消费为主。1983年农民用货币支付的消费支出在全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 已由1978年的39.7%, 上升到58.8%; 农民自给性的衣着消费比重开始明显下降, 在全部自给性消费中的比重, 已由1978年的2.5%, 下降到1982年的0.4%。

消费的商品化、社会化趋势, 还表现在劳务消费的增加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政策上支持和鼓励发展第三产业, 从而为城乡居民扩大劳务消费提供了条件, 刺激了劳务消费的需求。另一方面, 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人们对效益的追求, 生活节奏加快、时间升值, 城市职工和乡镇专业户、个体户都希望减少家务劳动和其它劳务, 以便更好地把时间精力集中到生产和工作上, 多腾出一些自由时间。这也有力地推动了劳务消费的商品化、社会化。1978至1982年, 全国居民用于商业性劳务支出的总额(不包括个体服务的营业额)增长了44.9%, 城乡居民人均购买商业性劳务支出每年递增8.6%。劳务消费在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消费领域的这种变化, 在我国生活方式发展史上有着深刻的意义。

我国消费方式的这些变化, 仅仅是开始, 尚未完成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生活方式的转变, 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当低。但就已经出现的这些变化而言, 已显示出我国消费方式正起步向新的阶段迈进。

三、经济体制改革对时间支配方式变革的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人们的时间支配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较突出的表现为:

1. 时间观念在增强

对经济效益的追求, 使人们对时间价值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时间就是金钱”的观点,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对时间的珍惜, 使人们在生活中追求快节奏。以往那种开会、办事、工作慢吞吞的现象, 日益引起人们不满。不少人舍得花钱“买时间”。在我

国农村，过去农民的时间最不值钱了。现在，农家对时间看重了。农民做工经商惜时如金，为了抢时间，抓行情，争速度，舍得花钱打电报打电话，成为“抢时间的人们”。

2. 缩减劳动时间的苗头已经出现

缩减劳动时间，在过去被看作是遥远将来的事情，是发达国家的事情。改革以来，一些工厂企业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基础上，也开始实行减少工作日或缩减每日劳动时间的制度。报载，天津精密铸造厂、黑龙江阿城继电器厂等单位，从1984年就实行了五天工作一天学习的制度；南京机床厂还试行了每天六小时工作制；上海同兴袜厂根据生产特点，变八小时集中生产为弹性时间分散生产。一些城市还实行了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休假制度。在农村，有些地方的农民改变了过去成年累月干活的习惯，也开始象城里人一样过星期天了。这在我国农民生活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3. 闲暇时间的支配方式在开始变化

人们越来越希望缩短家务劳动时间，扩大用于自身发展和文化生活的时问。传统的一日三餐自炊自食的习惯正在受到冲击，许多职工开始追求快餐和方便食品。为了扩大学习时间，在自由时间不多的情况下，不少人把文化娱乐和家务劳动压缩到最低限度。许多青年人闲暇时间不再东游西逛，而是进行自学，或参加各种业余学习活动。文化学习时间的扩大在农村表现得也很突出。1983年参加文化技术学习的农民，已由1979年的150多万人增加到1,490多万，五年间增加了近十倍。全国已有24万多个村（队）建立了农民夜校或各种培训班。

在闲暇时间支配方式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个性化倾向。现在，占用闲暇时间的集体活动减少了。人们更多的是按照个人爱好和实际需要，用多种多样形式支配闲暇时间，从而形成了利用闲暇时间的个性化倾向，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表现出了这种倾向。

在时间支配方式上为什么短短几年会出现这样引人注目的变化呢？从经济体制改革影响的角度来看，至少有这样一些原因：

1) 建立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迫使人们增强时间观念。

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取代原先的计划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最根本性的变化。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的建立，使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想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遵循价值规律，使自己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靠劳动效率的提高获得利益已日益成为根本的途径。这样时间与价值的关系比在计划体制下显现得更充分，时效的作用更加突出。价值规律迫使人们不能不重新矫正对时间价值的认识，增强时间观念。

2) 鼓励社会主义竞争，迫使人们重视时间效益。

经济体制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互相协作支援的关系，但并不排斥竞争。竞争，一方面迫使商品生产者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每件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追求时间价值。另一方面，迫使商品生产者对市场做出灵敏反应，注重时间效益。在生产和流通条件相差不多的情况下，谁能较快地掌握信息，较快地作出正确反应，谁能较快地跟上市场变化，抢在时间前面，谁就能获得较多的利益。作风拖拉，反应迟钝，行动缓慢，就会在竞争中失败。客观的效果是无情的，成功或失败的体验，会迫使人们不能不重视这种时间效益。

3) 劳动与自身物质利益挂钩，提高了劳动者关注时效的积极性。

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确立个人、集体、国家三者间的正确关系。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把权、责、利结合起来，农民看到了劳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自身的

实际利益，就在主观上激发了充分利用时间、追求效率的积极性。改变了过去那种干活“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的低效劳动状态。时间是自己的，使用就更珍惜。在城市，改革打破了两个“大锅饭”，全民所有制企业有了经营权，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经营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和职工的利益，调动了职工从关心自身物质利益上关心企业经营效果的积极性。在那些实行计件工资和承包的企业，职工的劳动效率决定着工资和奖金收入。这些就必然导致对劳动效率的追求，注重对时间的利用和节约。

4) 经济体制改革带来对劳动素质的新要求，促使人们扩大发展时间。

经济体制改革对劳动素质的影响，已在前边有关发展资料消费增长的分析中谈到。劳动素质新要求对扩大发展时间的推动作用，与发展资料消费的增长是同样的，这里不再赘述，可参阅前文。

5) 农村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了全部时间的支配权

过去，农民的整个劳动时间和相当一部分闲暇时间，都是由生产队统一支配，时间统得很死，农民没有主动权也没有积极性。改革后，承包制等于把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全部交给农民支配了。农民可根据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按照季节、气候变化的情况，灵活合理地利用时间，从而提高了时间的利用率。另外，在时间的利用形式上，也有了可体现农户个性的特点。有些农民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生产，以增加收入。有些农民在生产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则压缩劳动时间，扩大闲暇时间，进行个人发展和文化娱乐活动，在时间利用形式上表现出丰富多样。

6) 对外经济开放，带来了国外时间支配方式的影响

改革确立了对外开放的政策，使我国对外接触、交流增加了。我们在借鉴、吸取国外科学技术和经营、文化艺术等有用的内容的时候，与此相关的时效要求，以及国外的时间观念、快节奏的生活作风，也会伴随而来，对我国时间支配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经济体制改革对人际交往方式变革的影响

人际交往方式是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几年，人际交往开始受到重视，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往形式日趋多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清除了“左”的思想影响，使交往活动从政治压力下解放出来，人们可以自由交往，并激发出新的交往需求，是一方面原因；批判封建主义意识，打破小农经济自给自足、闭关锁国习惯势力的束缚，排除了开展交往的一些障碍，促进交往活跃，是又一原因；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的影响：

1. 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交往需求

以往，人们习惯于把人际交往仅仅视为个人之间情感交流需要，或者仅仅看作是亲朋之间的生活小事。交往范围比较狭窄，交往形式比较单调。近几年来，经济领域的改革带来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新局面，人们在实践中日益感到原先的交往内容和形式都不能适应了。因为新的经济活动要求人们不仅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而且还要有相应的人事技能和社会交际能力。不论是工厂企业、商业，还是个体户、专业户，只有扩大交往，才能及时获得广泛的信息，才能便于打开供销渠道，搞活经营。而一些缺乏交往的人，往往难于打开局面。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显示了交往的重要性。

另外，对外经济开放对交往也提出新的要求。过去，由于缺少个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有些人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显得交际吃力，不能适应要求。这种不适应状况就促使人们不能不重视社交问题。目前，“以善交际为荣，以交际广为富”的思想，正在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社交能力已成为许多人能力培养的内容之一。

2. 商品经济正在促使社交活动与经济活动的融合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得比较快。在经济活动中，交流信息、交流科技产品，建立协作关系，沟通供、产、销渠道等需要，都在呼唤着社交活动从情感交流和日常生活的小天地，走进经济活动的大舞台，促使社交活动与经济活动融为一体，成为经济生活的有机部分。许多单位、部门都已开始利用社交活动为经济服务。报载，上海春立贸易实业公司为了交流信息，沟通供销渠道，举办了“信息舞会”。许多企业供销人员来到舞场，边跳舞边交流信息。有的谈得投机，就索性到休息室拍板签约。以上实例说明，他们的社交活动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经济活动，很难把二者划分开来。

经济生活的变化正在创造着新的社交形式。一些跨地区、跨行业、跨单位的社交组织涌现出来，加强横向联系交往的联谊会、交谊会、联欢会等，十分活跃。这些都反映了我国的社交生活和交往方式在改革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以上只是论及了经济体制改革对生活方式的积极影响，而在实际生活中其积极影响远远不止这些。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经济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各方面社会变革，也会搅起一些社会沉渣，会伴随出现一些消极现象。如竞争会刺激某些人为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搞一些违法活动，伤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经济搞活以后，有些人会利用某些制度中不够完善的地方，乘机搞不正之风，在社交活动中泛滥不健康内容。对外开放以后，国外生活方式中腐朽的东西也会从不同的渠道渗透进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样会给铺张浪费之风泛滥提供物质条件，等等。有些消极的东西，虽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也有一些间接的影响作用，或者是暂时留下了可乘之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强法制，加强引导，认真对待解决，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同时，使生活方式的变革朝着文明、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

作者工作单位：天津社科院哲学所

责任编辑：张力之